

# 祖國

9

## 團結抗戰是向中國獨立自由邁進的雙輪

王禮錫

團結與抗戰是不可分的，團結與建國也是不可分的。敵人的目的在分化中國人，所謂分而治之 (Divide and rule)，是一切征服者最鋒利的武器。日寇口口聲聲要中國反共，其實他的敵人並不是共產黨，而是團結的中國人。把共產黨從「團結的中國人」中分開，無異削弱中國抗戰力量。

敵人不僅要把合力對外的力量分開，他們尤要把國民黨分開。敵人說不與中國的領袖談判，不與中國的統一政府——國民政府談判，而他却願和國民黨中的某人談判。其實談判和平是假的，用各種方式分化中國人是真的。過去中國人中竟有人相信反共的話，反共的徽菌既入這種人的血管，這種人便發生主和的敗血症。所以主和者多是反共者。假若今天共產黨中有反國民黨的，這種共產黨也必是會主和。凡一切反國民黨，反共產黨或反其他抗日力量的，必為抗日中的不健全份子 (Weak element)，其原因並不在其反國反共或反其他抗日力量，而在其反團結。

團圓結到底，不但在抗戰未得到最後勝利以前，團結不能破裂。就抗戰得到了最後勝利，亦非各黨派並力無以恢復元氣，建設新國家。由抗戰而獲

目錄

廿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

團結抗戰是向中國獨立自由邁進的雙輪

王禮錫

日寇非敗不可論

胡秋原

論文化人並忠告之

胡秋原

中國史學史

胡秋原

得的可珍貴的團結必須永遠維護，爭戰必不可再見於中國。

同時所謂團結到底，必須激上激下精誠團結。假若不離開事實的話，磨擦上實在一時尚不可免。但磨擦上上去一分力，抗敵上便消失一分力。要一般黨員對友黨無嫉妒之心，才能對敵人無鬆懈之意。所以團結，要由上層貫到下層，由中央遍及地方，由現在發展到將來。

中國今天的抗戰是無和的抗戰。問題尚不在屈辱的和平，或光榮的和平。前途只是日本勝利滅亡中國，或中國勝利求得民族之獨立與自由。

日本對中國的慾望，的確不是割地。而是以防共護黨之方式把中國領土全部吞併；不是賠款，而是以經濟合作的方式，使中國一切財產歸日本掌握。若日本要割地，要賠款，到是有和可議，雖然是屈辱的和平。對他「無領土野心」不但光榮的和平沒有，屈辱的和平也沒有。

有人說，中國是戰亦亡，和亦亡，與其不戰而亡，不如戰而亡。這也是不對的。

中國抗戰到底，只有勝利，沒有失敗，日本勝利只有三種：一、是消滅中國主力。敵人不能在上海，在南京，在徐州，在漢口，消滅中國的主力，在轉入山地戰的第二期抗戰時，全世界都知道敵人不再消滅中國的主力，不能粉碎中國的 Front。二是以誘和來消滅中國的抵抗，蔣先生歷來堅決抗戰到底的主張已經說明這是日本的夢想。最近汪精衛的開除黨籍，更證明用「和平談判」來亡中國是不可能的。三是停止戰爭，肅清佔領區域。只要團結到底，淪陷區是我們的前方；主力存在，據點在在交還。日寇決不能有空閒

發行人 龍取直 梅方義

主編 劉榮焱 敬幼如

編委會 胡秋原 彭芳草 胡業健 黃素心

發行所：祖國社

地址：重慶字水街67號

代售處：各大書店

定價：半年五角 郵費另加 全年一元



到底，他們就將陷於困境和絕境。

(二)日本整個國策，是以滅亡中國的中心的。誰也曉得日本有所謂大陸政策。這又名滅亡中國政策。日本一切用人行政一切小智小慧，都是集中於這個目的。日本人談不上學問，但對於中國之偵探，是世界頭等專家。如果「倭寇」能算一種學問，則日本人能得這一問學問之博士的，要比全世界之博士多得多！不是「滿蒙通」，「支那通」，不能做外相，也不能做首相，更不能做陸相。每一個日本軍閥官僚，都是兼造攻中國起家的。日寇宣傳我們反日，那不過由於每一日本統治者，其骨和血都是充滿「反華」細胞的。除了侵略中國以外，日本無所謂外交，無所謂內政，也無所謂國防。日寇甚至訓練他們的狗子吃中國人。若了解這一點，就一定了解中國與日寇不能兩立，還有什麼中日親善之說呢！明治維新以來，日本政權從來即在日本陸軍之手，就是因為侵略中國學陸軍。除了進攻中國，此外一切對日寇都是附帶問題。

(三)可是因此面有一個很大問題。爲了滅亡中國，日寇必然與其他列強衝突。中國問題不是中國一國問題。日寇要滅亡中國，就不能不對他國作戰，或對他國備戰。因爲，倘不如此，即使日本能够打敗中國（雖然這是不可能的假定），如果那時日寇實力業已完結，日寇還是有奪捕殘廢的危機，空空的戰爭結果還是不能算數。過去許多人誤會，中日戰爭是反蘇前哨戰。其實日本擴張海軍以及每一日仍與俄小衝突，都是進攻中國前哨戰，或更大規模進攻中國的前哨戰。田中義一說得好，一九〇四日俄之戰，實是中日之戰。日本其所以擴張海軍，與其說是對付英美，毋寧說是掩護其進攻中國。日本陸軍是日寇之打手，而日本海軍只是其陸軍之保鏢。日本與德意訂立所謂反共同盟，在我們看來，只是日本侵略中國之自然他國同盟。日本的目的在利用此契約牽制我們友邦對我援助。（德義也亦是利用日本牽制蘇俄與英國。）因爲這一原故，於是日寇要進行大陸政策，就是邁着第一大問題，要進攻中國，也必須有力對付他國。

(四)因此，因這一戰略形式，日寇內部從來就有兩個派別。這派別是由進攻中國方法及總戰略而來的。一派可以叫做「變通派」（必須對外派）。這一派以爲，要滅亡中國必須先解決外面的威脅。從前田中，海軍中之水野，陸軍中之澁木，都是抱這種見解的。而世界上往往稱這一派爲急進派或法國派。一派可以叫做「倭華始能對外派」。這一派以爲，必須集中力量，在中國建立日本根據地，一步一步的一面蠶食中國，一面來武裝日本，才使中國亡了。

日本業已強大，不怕列強干涉。幣原也好，林十郎也好，宇垣也好，都是抱這一種見解的。而世界上往往稱這一派爲溫和派。從來日本政爭，都是這兩條路線之爭，五二一六之醜劇，也是這兩條路線之爭。但無論哪一黨路線，在執行之際，技術上自有冒險派和穩健派之不同。例如進攻中國不成問題，何時進攻，進攻範圍，自然也有不同意見。但這畢竟是較小問題。在這兩大派摩擦之中，特別在二木元老與田中調節之下，日本政策是走第二條路線的。日本肅軍之成功，就是倭華爲主派的成功。自荒木去職林十郎組閣以後，日本的路線已確定走第二條路。表面上日本政局日益法西化，但實際上日本法西派早已變質了。過去日本法西派還想先把蘇俄由遠東擊退，再來進攻中國。許多國際觀察家相信，在一九三二——三三五年間，如日本走第二條路線，是聰明或愚笨實未知。但無疑的，以後日本再也沒有力量敢正視蘇俄了。今日是友邦蘇俄的力量，威脅日寇的時候了。如過去日本法西派還想先攻外而後倭華，今日只好拚命縮小範圍來進攻中國了。可是，一切友邦了解，這不是出於日寇的仁慈，只是出於日寇之無力。遠東實力對比業已發生變化。過去友邦不敢大膽援助我們和制裁日寇，主要原因之一，也是因爲日寇還有相當實力，足以威脅他們。因中國長期抗戰，日寇日蹙，友邦日強，而中國也能愈戰愈強，而友邦不僅敢於大膽援助我們，而且還可進一步制裁日寇，於是日寇不死於這種慢性流血之下還有什麼希望呢？

不爲外國及俗流名詞所誤，才能真正判斷敵情，確定必勝計畫。

(二)日寇戰略失敗了。

我曾經說：「本來日寇倭華政策，本身包含一大兩難之局。日寇要吞滅中國，不僅暫時要應付列強干涉的戰爭，而且，如日寇不能與列強一戰而勝，亦不能保證其在華侵掠之所得。因此，日寇最如意的算盤是：對中國以速戰速決的方式，一塊一塊的佔領；同時，以不惜與列強一戰的姿勢，嚇住列強不敢干涉；然後慢慢固其在華佔領領土，增強其實力，再繼續進行這一戰略。於是到了中國完全被佔之後，日本也就有力來對付一個世界戰爭了。然這戰略已被長期抗戰打破了。（日寇的戰略與我們的努力——蕭好與發言）

八一三的上海抗戰，打破了敵人的戰略。我們長期抗戰及十八月的成績，業已打破了日本的國策和戰略。而隨戰爭之延長，日寇的戰感矛盾只有日益擴大。希望一石二鳥的日寇，結果是中國既不能屈服，而同時是日益受到列強的威脅。抗戰以來，日寇政治上的各種變動，都是想解決這個矛盾。

可是，日寇的矛盾是愈來愈大。因為只要中國不和，這矛盾就要日益擴大，無可救藥。而敵人這失敗是業已無救了。我們不妨看看這個情形的經過。

馮橋事發生後，日寇以為可以不戰而屈中國的。所以日寇當時只撥了一月的軍事預算。到了上海戰爭發生，日寇還想速戰速決，所以也預備了三月的軍費。南京陷落以後，日本實在希望中國「屈膝」，會惹起美國大使出來調解。同時，則轟炸美艦，試探列強態度。但美國的強硬，使日寇有戒心，所以南侵計劃一時終止。正是這時候寇閣改組，荒木入閣，表示日寇決策的困難。

到了日寇明白我們決不屈膝以後，這時候碰遇到一大難關。大家應該還記得，當時日寇開什麼御前會議，一時有宣戰之議。宣戰不宣戰，對日寇確是一大問題。開戰以來，日寇稱戰爭為事件，日寇不稱戰爭而稱「事件」，是極有意義的。這兩個字表示日寇開始決不願將戰事延長，而也充分暴露日寇的戰略弱點：

(一) 如果真正以全力與中國作戰，則日寇必須宣戰。倘若宣戰，日寇即須扣留他國軍火，而這可以引起國際干涉將問題擴大。而在打了三四月戰爭以後，日寇是不願引起這種干涉。但如果不宜戰情形是否好一點呢？其他國家有權供給中國軍火，日寇即須在中國不斷消耗。在日寇流血之時，其他友邦，特別是美俄，即日益增強軍備，日益威脅着日寇。

(二) 如果真是動員全力對中國戰爭，對內即須動員大部分兵力來華作戰。一戰而破中國主力，這希望很渺茫；如果這時其他各國動一下怎麼辦呢？若是不能打破中國主力，則日寇不獨不能威脅中國，更不能威脅列強。

所以日寇還是在一個中間「安全」之策。當時我曾指出日寇策略一面是威脅我們「屈膝」，同時仍希望盡可能「速決」，結果是謂一月十六聲明，不以國府為對手，而日寇則希望攻下武漢以後再誘迫中國「屈膝」。可見在我們堅守長期抗戰以後，日寇立刻陷於兩難之局。所以如我常說的，日寇是宣戰也難，不宣戰也難。而同時，在戰場上，是大大增援也難，不增援也難。這結果就是武漢陷落前的狀態。日寇在難關，時刻交授機。

我們試想，假如在蘆溝橋事變之時，日寇立刻動員一百萬軍隊，進攻北方和上海，如果一開戰之時，日寇即進攻廣州；也許我們要陷於很大的困難。然而日寇沒有如此。可是到了今天，日寇已無大兵可調，即使說已是戰爭而宣戰，已經未了不及了。

在去年四月，徐州會戰正在膠着的時候，日寇內爭正烈。當時近衛「傷

風」。但是，這暗潮得一穩定，結果是大大加增援，以全力進攻武漢。在四月二十七日，日本各報忽同時鼓吹「應完全變更國策」，結束中日戰爭，進攻廣東說日寇有力。我當時指出，敵人是希望避免列強干涉，集中力量於徐州。並說：「一個準備世界敵人的敵人只能以中國為對手，是日寇已承認其過去戰略完全破產了。」

馬上五月四日，敵人開始部分實行總動員法。這是「變更國策」的注腳。當時我說：「日寇之實行總動員法，即竭國力于戰爭，原是以世界戰多為條件的。在動員法案討論及通過之時，倭府一再聲明，此法在對華作戰時不予實施。而現在不得不傾全力于中國，已說明日寇戰時之破產了。」（敵實行總動員法——雪恥與兵役）。

但敵人不過部分實行總動員法，即仍想節約國力，對付列強。即夢想在武漢陷落以後，造成和局。於是敵閣改組，宇垣入閣。我當時會說，這是部分實行總動員法之政治障蔽，其目的在和緩蘇英，集中力量于進攻漢口（寇閣改組之意義——雪恥與兵役）。

而正在日寇為難之際，東方又發生一件不平凡的事——即張鼓峯事件。張鼓峯事件因日寇屈膝而解決。這解決影響是如此：(一) 日寇在世界之諸學露了自己的弱點，增高了友邦蘇聯的威信。(二) 日寇已暫時放棄反俄念則，企圖暫時集中力量于進攻我國。

有人說，中國抗戰為他國消了戰災。有人說別國有力量，無須感謝中國。這都對也不對。中國為自己已打不成。但中國之血，也為別國流了，這是事實（英報說，中國正為吾人流血），但是這並沒有什麼壞處。我們自己本錢不多，不能討便宜。然至拙也是至巧。我們與日寇打下去，友邦有援助，日寇不大能放阻侵略，而力量兼其支出，饑子愈小，到了最後，日寇前有我國，後有各國制裁乃至壓力，非倒不可。然誰是首功？同胞們，那就是咱們中國。我們能以至悲壯決心，利用日寇弱點，長期抗戰，打敗敵人。而除此之外，無他便宜之路。

這時如果歐洲暫時無事，或歐洲能出大事，日寇是異常困難的。希特勒侵瓜分捷克斯，幫助了日寇。大家應記得捷克問題正緊張的時候，宇垣捏了耳光。當時我曾指出，日本開關是因對匈歐局意見而起（九月卅日時事新報捷克問題討論會）。宇垣辭職以後，我曾在血路上推測。日寇將：

### (一) 威脅蘇俄，

### (二) 進攻粵海

### (三) 實行總動員法。

如事後很明白的，板垣等主張乘歐洲多事之際，噴調滿洲之兵南下，進攻廣東和漢口，使戰事早日結束。武漢衛去了。近衛於是乘時大放其妖言。這一着，有一滴水的那樣的結果——汪精衛之變電。然整個中國依然照固定國策而前進。蔣委員長有嚴正偉大的聲明。日寇妄想成空，黔驢之技已窮。於是就不得不決定實行總動員法，而近滿滾蛋，平沼登台了。

這時敵人談百年戰爭，已經不是事件罷。從一個月到一百年，說明日寇失敗到什麼程度。無怪日本軍閥日登受到估計錯誤的批評，而「支那不可征服」的危險思想也發生了。日寇失敗到了今天如已經說過的，無可救藥。然而何以失敗呢？

(一) 日寇國力和其野心不相稱。

(二) 日寇對我估計和實際不相符。

總之，日寇不應該有什麼大陸政策。日本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存在。

### (三) 總動員法是什麼意思？

現在要略為說到總動員法問題。

去年三月政議會開始討論總動員法時，我曾說：「動員法是一定通過的。這是要限制及禁止勞資糾紛，統制及限制個人紅利分配，限制集會自由。這是日本準備世界大戰的政治經濟之軍人獨裁」。日寇瘋人院之命運——政局與政局。

總動員法是要動用整個日本國家戰爭。動用生產的一切於戰爭。這原是日本最後的本錢，最後的武器，用來作世界戰的資本的。日本不能不以世界戰資本對付中國「事件」，表示其整個戰路失敗；而一半年的戰爭就要實行總動員法，也表示日寇力量之薄弱。所以在去年五月初敵人開始部分實行總動員法時，我曾說：

「總動員法就是要把握整個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結構，放在戰爭基礎之上，將整個日本人力物力財力和思想，都受軍人支配。在一種意義上，日寇在實行動員法之日已完成一不流血的政變了。……今天日寇於侵華失敗之餘，不得不企圖將其國際戰資本用於中國戰，已說明其戰略之破產。……總動員法不足畏。因為第一，業已動員不少；第二不能完全「動員」。……雖然我們也決不能輕敵」。 (魯恥與兵夜)。

現在敵人實行動員法，特別是第十一條，是其最後一著的最後一著，今日實行全部總動員法只說明兩點：

### (一) 日寇已將其作國際戰之資本用於進攻中國；

(二) 舊公債之術業已途窮，全國國民業已無血，只能割資本家之肉來支持戰爭。

總之，敵志已怯，敵力將窮。一年半以來，日寇領大軍費靠公債。公債一貨幣應衝，只能將錢搜集攏來，轉嫁負擔於平民，並不能生產什麼東西。公債發行究竟有限度。到現在為止，日本發行公債方法，是由銀行承銷，而以公債為發行紙幣準備，政府以紙幣購買物品，擴張軍事工業，而資本家將其利潤流入銀行作為資本。但現在是要將利潤整個拿去使用了。

許多人觀察家認為總動員法之第十一條將引起日本財閥軍閥之衝突，而此法實行，即變更日本資本主義之性質。所以說其就是宮刑，不如說是強心針，或苦肉計還更為恰當罷。而且，利潤之統制，德義均已在那種程度上實行，然德義並非非資本主義國家。這是使用私有財產，並非否定私有財產。然而何以財閥不願意呢？財閥在三個條件下是幫助財閥賭博的：

(一) 賭博絕對勝利，

(二) 賭法財閥參加意見，

(三) 賭本出自一般百姓。

但今天軍閥是要拿去孤注一擲，而且要自己掏腰包，所以資本家就不放心。戰爭會有結束希望，財閥能賺錢；戰爭無結束希望，財閥就愈吝嗇。也是日本軍閥屢次保證連和，公債才能推銷。所以汪精衛的一個體電，也能幫助日本公債十幾點鐘的景氣。但到了這希望破產以後，日本財閥不能不吝嗇了。但事已至此，財閥亦無如之何了。動員法勢在必行，於是平沼組閣。這是一個困難時期。但動員法實行雖無問題，但一定要引起困難及消極抵制也是無問題的。不過更重要的是即使實行動員法不能解決日寇困難。

### (四) 平沼將為日寇送終

平沼內閣成立之後除了加緊進攻我國不成問題以外，對日寇有何影響呢？

(一) 增加國際孤立。英美有許多人都希望日本文治派勝利，他們今天雖時斷念了。

(二) 增加國內摩擦。財閥一定意工。

日本軍閥知道如此。但不推平沼出來，他們也無辦法。他們還拉著近衛減少軍人專政色彩，同時將末次留著，準備最後一步。

敵人一面應付中國戰爭，同時不得不勉強應付列強橫軍。敵人不能不如此自縛。但敵人也不能不如此。現在平沼雖向政黨好戰，目的自只在幫軍閥過預算。據說一九三八年一、二九年度預算為九十萬萬日圓。

波收全部利調及整個借款也不够此數。日寇國外貿易減低，借款無望，產金有限，在中國所謂「長期建設」也是鬼話，我相信軍事費決無辦法。從前高橋曾百億亡國，前首相也只說可再發兩百億，到今年三月為止，日寇應發公債僅一百七十萬萬，照目前一年之內日寇處要發到二百四十億以上。在這一百年之中，即使沒有特殊變化，可說也一定形成財政上崩潰。何況中國一個大勝國際的報復，更是與其可能提前舉日本。但不到這時期，日寇一定因經濟上的困難而發生嚴重內爭的。平沼內閣大約還有半年壽命，到了敵

人內部更趨之日，也許未久出。也許不，也許末次做日本軍閥之接統的人。日本崩潰以後會怎樣呢？過去我相信日本有歐戰後俄國化或德國化的兩個可能。但現在我看第一可能沒有。日本經濟及戰事崩潰以後，不會革命，但會政變。如果我來作一預言的話，也許那時經濟之流來做日本的亞爾培或斯特萊斯曼的。而在這情形下，也許出些小日本希特拉也未可知。我們如看出了日本的前途，不要對付今日之平沼，還要對付可能的弊原。總之，無論對日為安全，必須統一到抵抗到底，堅守今天的國策，同時對英美蘇法諸友邦不分配此的合作下去。照民族的中正之路，進行抗戰建國事業。雖然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勝利還不是安全，但如我們能將未來安全和今日勝利一并考慮，一定會能有勝利。

總之：長期抗戰不僅是打中敵人弱點，也能推遲國際對日壓迫，不僅決定中國民族生存，也能決定今後世界局勢。（一月廿日）

## 論文化人並忠告之

胡秋原

抗戰以來，我國政治上有兩種不詳的成分：

一是所謂防共主義者如汪精衛之流。二是自命左傾文化人者。他們是摩擦的根源，是「摩擦」的假使。有一種社會化學，亦可稱他們為「摩擦」罷。他們找尋孱生蛆，惟恐統一之鞏固。他們缺乏民族自信心與責任心，是很少區別的。

而文化人不懂在政治上摩擦，還要在學術上欺人。抗戰前後，中國學術界有兩種偽學：

一是神效日本歐美教科書者。二是左傾文化人之公式主義。防共主義者業已破產，俗學也漸失信用，這是中國政治文化日益健康之表現。在最近「文化人」亦受到全國人民的厭棄了。國訊一八二期上，徐中主先生痛論「文化人」之墮落；最近中山週刊，也有人指出「文化人」一語之惡劣

與不通。不料「文化人」若不懂不自省，還要自己覺得理直氣壯，甚至於老羞成怒了。最近在某刊物上有一個「文化人」說，說學術沒落「不要文化人」就是民族敗類，是出賣靈魂，是要證明抗戰必亡云云。這不知道是什麼邏輯。他們以為他們的學術很高明，而他們是什麼國貨？我曾說過中國學術衰落，也說過不要文化人的話，無論這位文化人歇斯底里的中傷同誰而發，為了糾正中國政治上文化人的惡風，我不能再說幾句。

我們的「文化人」者，是自以為彷彿極國天皇，神聖不可批評的。誰要指出他們的墮落與不通，他就用漢奸來譏刺和受傷。這是他們的救命符。例如不久以前，有一位「準文化人」在「不要修談資本主義」一文中，說在重慶談資本主義也是漢奸云云。其實我主張資本主義，已經五十年了，在漢口，我也談過。為什麼要談？今天要發展工業不能不避這個問題。而在我看來，中國也談過。為什麼不要談？日本資本主義的勝利就是中國資本的勝利。除非擁護中日經濟合作，必須愛護民族資本。而我也深信中國民族資本也必然勝利。而這也可鼓勵一切民族資產階級擁護抗戰。然那位「準文化人」說「不要修談」，其實不過是只準他們「修談」其莫明其妙的「社會主義而已」。修談社會主義自無不可（只要不是日本的社會主義），但說說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是社會主義戰線，也就不能否認資本主義者的主張和地位。我們相信，今日只要是一個中國人，而只要擁護抗戰，任何人無權反對他的理想。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應禁止他人抱資本主義的理想，正如一個資本主義者不應禁止他人抱社會主義的理想。這不僅因為在日寇之前，任何思想不能實現，而且因為，大家都應服從三民主義的節制。若干人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三民主義，這是便宜的，非論理的說法。我們只能說：一切在中國所能發生的合理思想，三民主義都能包括；而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，其所能要求的，不能超出也不應超出三民主義所能實現的範圍。三民主義是一切思想的尺度和平均數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思想的理由在此。有這樣合理的認識，才勉強也無「摩擦」之心。我們只問是否抗日，來分朋友；只有頭腦混亂的人，或無強也無「摩擦」與責任心的人，才不容許他人根據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來抗日。今日勞資必須絕對合作。互相愛護。只要抗日，勞資都有前途。這是事實。如有人虐待工農或階級鬥爭，都是不明大義。說只有某一階級革命，是自己分裂。今日國共必須絕對和協。只要抗日，每一中國人都有前途，何況黨？這是事實。如有人不了解這民族統一之神聖與嚴肅，傾軋挑撥詭譎其間，是民族的小人，是精神上政治上都欠健全的分。

如文化人想對我們中傷，是徒勞的。就不說九一八以前，從九一八到今天，我們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抗日。文化人能够否認這個歷史？抗戰以來，我們無條件擁護政府抗戰到底。爲什麼？因後這是全民族最凶最惡之惟一之敵，而只要抗戰到底，中國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。所以我說，抗日就是一切，一切歸于抗日。即使我們今天不能爲抗戰盡最善之努力，但我們無時無地不是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，絕對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。而在一年半的言論中，無不堅定之主張，指出必勝的理由。除非喪失良知或別有用心者，斷不會對於擁護民族統一抗戰者狂妄中傷的。

但我覺得「文化人」要不得，還不在此。第一、他們的言行只是增加精誠團結的障礙。他們和防共主義者一樣被弄是非，播散離異(Division)風氣。不過一向這邊擠來，一向那邊擠去而已；一危言聳聽，釀造糾紛；一奔走遊說，攻訐政府而已。不成問題，今日政府一切，決非盡如人意。但這是中國惟一政府，抗日政府，我們只有充實他，愛護他。過去我也反對過這個政府。但今天在對外抗戰，而且抗戰根本改變了中國問題，我們只有在法律立場，謀政治之改進；只有在鞏固統一抗戰到底過程中，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提高法律的威權，來改進政治。然「文化人」仍將他們抗戰以前的那一套作風，在今天表演。這除了增加摩擦與敷衍，造成內部攻防之外，是毫無結果的。我在漢口的時候，曾以不悅不求之義，忠告雙方的職業摩挲家，說今日建設心理的調和爲最必要。并對文化人說：要有東林主義風骨，不可有東林主義作風。這是空事，全國各方面負責的政治家可說是日益賢明而知大體了。可是「文化人」的作風不改。他們還弄弄，向口舌；他們說各黨各派，把自己硬列爲一黨一派，作爲「理論基礎」。他們到過前司令部下，就要來什麼「號召」國人。今天不是玩這一套把戲的時候。他們竟自命救國專家。從前歐洲有容國社社會主義者，我們也有容國社的救國專家！其實即使救國是國民義務，他們却要藉此招搖。招搖不遂，怨謗生焉。這直接間接對於國內統一國際同情都有極大影響。第二、他們不學無術，還要自作聰明。他們厚浮淺薄的公式主義，是對學問之冒瀆，每一個有誠意於民族及學問者，不能不加匡正；而「文化人」中之有正義感者，也自己起而糾正了。他們除了填公式以外，所知多少？而他們是填公式的本領也不够的。他們之所以還派政黨之爲民族奮鬥是民族之幸事爲國人所同情的。但這推搖屋瓦之愛，國人是有了一定限度的。我相信每一個有自由主義教養的人，對於思想不同的人

物，只要其忠於所信而真誠苦爲民族奮鬥，無論爲左爲右，都必加以敬愛。例如，即使我不信佛學，但對於弘一法師這類人物，頗尊重。但對於所謂居士之流，我則絕對鄙視。居士而講經說法，是對佛法之嘲笑。他們只能講野狐禪，變變禪，而又不守清規與戒律。所以從前真正高僧，并不即接文居士。「文化人」者，正類於一種左傾的居士，抗戰以來，他們自己翻閱前後國際問題，談日本問題，談中國問題，談捷克問題，但請他們自己翻閱前後言論一次，幾多不受到事實的反駁？受到反駁也不要緊，但何以還要自命「文化人」，說只有他們有最正確的理論呢？

所以，我必須對於「文化人」提出這點忠告，如我對於另外許多虛無主義者乃至貪污之徒提出忠告一樣。「文化人」是很少人忠告的。虛無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因其弱點不敢說他們，貪污之徒因其弱點結交他們，天真學者因其弱點崇拜他們；即使我對國家盡力微薄，但我對民族有信心有責任心，有權利批評這數人；即使我所有者不過一點基本常識，但無論講政治經濟哲學文學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乃至於馬克斯主義，我看他們都不大够水準。如「文化人」要強辯，我也可在他們若干人的大作中每一頁指出其亂說的。從前章實齋笑一孔之儒爲橫通，而今日「文化人」是橫不通。如他們還有一點本領，就是作「殺千刀」的罵術。但在這一方面，則請他們去與以前「社會新聞」上的那位朱新榮又名朱其華者比武罷。

明天時候，王學末流氓猖狂，一時有滿街皆是聖人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的話。今日士風學風之腐敗，只要將「聖」改爲「文化」，「菩提」改爲「救亡」，也神氣活現的。後來顧哲齊先生說：

「上者但學先儒講句，稍涉文義，即欲承先啓後；下者但問朝廷科甲，才能揣摩，皆極富貴利達。浮言之類，甚於焚坑！」

今日國勢更危急，但前途也更光明。這腐敗相快過去了。對民族與文化有誠意者，大家都在自勉奮發，這是極好現象。但對任何同胞除非是絕無希望者，應該視其爲國盡力。我願意自命「文化人」者，首先拉下自己紙糊的文化人的王冠，切切實實爲國家多盡點義務；假使說要擁護抗戰，就切切實實作點抗戰的事；倘說學問，就首先虛心多讀點基本文化人的書，對民族主義和科學精神多加以體諒。千萬莫做空頭救國家，空頭文化人！

但「文化人」畢竟是小事。要緊的還是鞏固統一抗戰到底。全國負責的抗日力量和政治家不分黨派，徹底統一團結，左右小人即無所施其技倆。而修明政治發展產業與科學，自能促進中國文化之復興。(一月十七日)

